

# 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发展

## ——城市级层结构、融资能力与迁移政策

蔡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100732)

**内容提要:** 中国转型时期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模式,既区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力量(如城市的自我融资能力)和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行政级别的影响)都对城市的发展起作用。计量结果表明,由于市场发育水平的不同,中西部地区在城市发展模式上显著区别于东部地区。前者仍然具有浓厚的转型特征,行政分配资源仍然对城市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东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市场导向格局已基本形成。由于一些城市仍然依靠再分配资源发展城市,具有阻碍人口流动的动机,扭曲了城市化整体格局。因此,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有利于加快和完善市场条件下的城市化机制。

**关键词:** 城市发展 城市级层 自我融资 户籍制度

以人口聚集和城市发展为特征的城市化过程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其一,是城市数目的增加,即通过新生城市来提高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另外一种方式是现有城市的持续扩张,通过移民的方式不断增加城市人口,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城市化。Krugman(1993)认为,在制度环境适宜的情况下,新生城市的诞生有赖于某些有能力的代理者(如开发商)的行为。如果缺乏这些代理者,城市化倾向于走“大型化、数目少”的道路。也有人认为(Henderson和Becker,1998),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大城市过度发展的情况,是由于中央政府的干预使得土地市场和地方政府都难以有效地运行,因而也无法衍生新的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战略内生于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土地市场的运行会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产业结构特征、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都会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影响。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以及经济转型时期的城市发展过程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些事实。本文通过改革前后城市发展型式的比较,特别是通过对经济转轨时期城市发展的特殊动力和机制的考察,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 一、改革前后的城市发展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道路。为了保证工业化的积累,城市化也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内,以便有比较大的农村经济规模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Lin et al. 1996)。控制城市化水平的措施一方面体现为对城市数量的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使城乡之间相互分割。一个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这个制度把城乡人口的分布人为割裂开来,人口的自由迁移被禁止,城市化过程因而未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得以推进。从1949至1978年,城市数量一直被控制在200个以下,在部分经历经济危机的年份,城市的数量甚至绝对减少。实行经济改革以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约束人口迁移的政策也有所松动,因而自80年代以来城市数目有了显著的增加,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到1998年全国城市总数已达668个,是改革以前的3倍

多。然而,由于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并没有完全取消,户籍制度仍然在约束着人口迁移行为,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还不能反映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一个表现就是城市增长主要表现为数量在增加,城市内涵扩张的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大城市发展相对缓慢。县级市的增加占新增城市的绝大部分,每年新增城市有一半以上是县级市。新生城市大多通过撤县建市的方式产生,其衍生过程使用的仍是行政审批的手段。

从城市内涵扩张途径看,城市人口的增加同样是受到整个经济发展战略所制约的。实际上,计划经济时期的主要城市化战略就是控制城市人口,其实施手段是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严格的移民政策,以达到保持城市人口的可控制规模。以前的研究(蔡等,2001)表明,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口的迁移政策服从于实施工业化战略的需要。例如,在农产品供应紧缺程度高的时候,为了保证工业化的积累,迁移政策就趋紧,其实施的具体手段就是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作用已日趋削弱,但由于地方政府往往面临就业压力,以及当地居民对城市拥挤、治安等等问题的抱怨,所以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种种限制措施来阻碍迁移,这也就成为近年来阻碍城市化进程的另一个因素。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级层是按照当时的城乡关系确定的,即为了最大限度地汲取农业剩余而形成的城市发展模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看,城乡资源配置似乎是分割的,形成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但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和目标,实际上城乡的资源配置是一体的,即城市是仰仗其触角所及而获得的农业剩余得以发展的——城市发展是依赖型的或再分配型的。改革之初的一项仍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改革——市管县或市带县就反映了这种城乡关系。这时的城市级层几乎等同于级别,不同级别的城市规模分别由其控制的农村的范围所决定。同一级别的城市应该没有规模上面的差别。

假设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关系是相互辐射型的,但各自的发展具有独立性,即分别取决于自身的融资能力而得到发展。城市不再靠汲取农村剩余得到发展,农村也不依赖城市。当然,两者之间的产品交换和生产要素流动没有障碍。城市级层取决于一系列与其发展潜力相关的因素,所以城市规模各不相同,但没有什么级别之分,也不应该有生活水平上的差别。

在经济转轨时期,城市发展模式从前一种向后一种转变,形成了一系列过渡模式,即城市发展既依靠自我融资又依靠再分配,由此城市发展模式分化为三种类型:(1)既有再分配来源,又有自我融资渠道得以发展的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尽管可能在自我融资方面也具有很强的优势和能力,但由行政级别所赋予的优越性和承担的责任,使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再分配。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得以吸引大量投资,但同时又被赋予计划单列地位的城市,也属于这种类型;(2)主要依靠自我融资得以发展的城市。这基本上是指沿海地区的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依靠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得以迅速发展的新兴城市;(3)再分配来源枯竭,自我融资能力没有形成从而难以发展的城市。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很可能陷入这种境地。这三种类型城市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方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因而也不尽相同:第一种仍然具有一定的计划经济色彩,第二种是比较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模式,第三种虽然介于前两种之间,但由于财政拮据、筹资无门,城市建设往往陷入尴尬境地。

与城市发展的上述类型相对应,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迁移政策改革在进展上也有巨大差别。城市政府的改革动机通常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城镇的户口已经没有什么含金量。即城镇政府既不保证提供就业机会,也没有通过户口可以获得的福利。因此,增加城市人口规模不会加重城市政府的财政负担。第二,城镇的发展已经或者期望从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配置效益。

是否进行迁移政策改革,在什么时机进行,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如何,都取决于改革主体——城市政府对于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及判断。在图1-a中,横轴代表政府进行迁移政策改革的力

度(因而也是努力),纵轴代表这种改革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政府之所以选择进行改革,是因为地方经济从中可以获得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收益。而随着改革力度或努力程度的提高,城市可能出现过度拥挤现象,政府财力不逮,失业率上升,社会不稳定程度提高。因此,改革的边际成本会提高,边际收益会降低,改革就不是有利可图的了。因此,改革力度通常止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两条曲线交点所决定的水平上面,即图 1-a 中的 E 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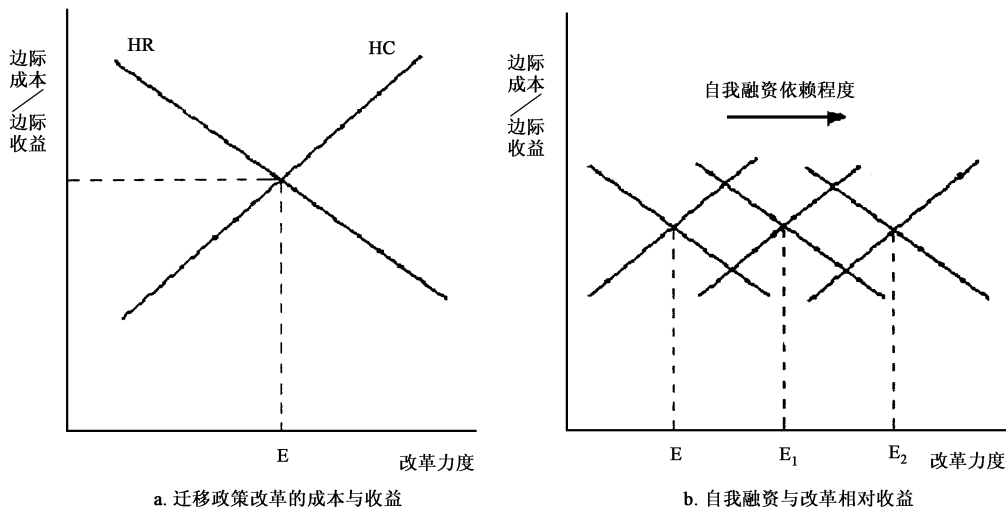


图 1 迁移政策改革的成本与收益

改革的力度从而为改革付出的努力,取决于从改革获得收益与改革本身的成本之间的均衡。而决定改革成本与收益以及两者之间均衡的决定性因素,是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益的相对重要程度。一个城市的发展越是依赖于自我融资,它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以及城市发展带来的聚集效应中获益就越大,其推进迁移政策改革的成本越小,收益越大。因此,处于不同的城市发展类型上的城市,进行迁移政策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均衡处于不同的位置(见图 1-b)。在那些地区经济和政府都比较切身地感受到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Cai et al. 1999),或者城市政府不再能够承诺政策性的社会福利的城市,户籍制度从而人口迁移政策就能够获得较深入的改革;而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的城市,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仍然较大。政府承诺实现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居民的全面医疗保障、良好的市容,甚至较低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等等。虽然政府也看到了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提高配置效率,但维持较低的失业率和下岗率,保持社会稳定等承诺具有更高的优先地位,因此,大步改革户籍制度的激励就不足。现实的确如此。无论是从所公布的政策措施,还是从实际实施的效果看,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式和力度各地城市都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在实践中,每个省份甚至每个城市的改革措施都不尽相同,从比较彻底的改革举措到微不足道的改革意图,形成了一个可供分析的系列。我们可以将这个系列归纳为三种模式,从中可以看到改革力度的依次减弱。

第一种模式以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为代表,特点是“最低条件,全面放开”。2001年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并且从当年10月1日起,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从试点走向全面实施。在全国2万多小城镇,入户的基本条件降低到只需“在城镇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合法住所”,凡符合这些条件的外地个人或家庭皆可申请获得城镇户口。这可以说是1958年实行户籍制度以来迈出的最大改革步伐,是比较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

第二种模式以中等城市及一些大城市为代表,特点是“取消限额,条件准入”。随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许多中等城市甚至一些省会城市也进行了力度比较大的户籍制度改革。其

做法是放宽申请条件,大幅度降低在城市落户的门槛。例如,石家庄市的一条最容易达到的条件是“具有本市2年以上劳动合同”。市场发育比较快、经济活跃的一些沿海地区中等城市,以及中西部急于加快发展步伐的大中城市,都采取了这种模式。这种户籍制度改革模式,既符合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客观要求,又符合循序渐进的改革推进方式。

第三种模式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为代表,特点是“筑高门槛,开大城门”。在许多中小城市纷纷放松户籍控制的同时,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仅仅为特殊人才的引进开了绿灯,而对广大普通劳动力的进入反倒抬高了准入门槛。例如,上海市甚至停止实施其门槛已经很高的蓝证户口制度。因此,门槛提高的结果并不导致城门的开大。比较而言,这类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尚没有实质性的进步。

可见,经济转轨时期的城市化实际上与市场化进程是一致的,两者互为条件。随着整体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从而消除了城市发展中的资源再分配因素以后,阻碍城市化的障碍也将得以消除,城市化进程会进一步加速。以下的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将通过对改革以来城市化的进展,检验上述关于转轨时期城市发展的假说。

## 二、自我融资与再分配:转型时期城市发展动力

从根本上说,城市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是由于聚集所带来的节约。由于城市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不象农业那样具有土地密集的特性,因此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经济(Marshall, 1890)就会成为城市聚集并扩张的动力。较早期的文献已经讨论过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城市规模的均衡问题。Mills(1967)认为,如果城市的生产与贸易集中于中央商务区(CBD),而城市的居住由中央商务区以外的地区提供,因而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从CBD以外的地区到CBD地区的交通成本会提高,城市的拥挤程度也会增加。城市规模将在增加一人所导致的成本增加与规模经济相抵时达到最优。Henderson(1974)指出,城市规模的差异是由于不同的城市之间存在着类型上的差异,城市之间的贸易使得城市的发展趋向于专业化。城市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城市的类型,而城市的类型又决定了城市的规模。

显然,在市场较为完备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资本和劳动力会根据价格信号的引导流动到回报率高的地区。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不断聚集导致了城市的扩张。然而,转型经济所特有的双重特征使城市扩张的原因变得较为复杂。城市的自我融资能力,以及通过行政手段再分配资源都会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以下的简单模型旨在说明这两种力量在经济转型时期是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的。

假定城市是由很多具有相同效用函数的人组成,城市计划者的目的在于满足城市总体效用的最大化。假定市民的效用函数是可以累加的,那么则有:

$$U = \sum_i u_i \quad (1)$$

城市的发展会给每个市民带来效用,因为市民可以从城市发展中得到福利,即

$$u_i = u_i(m_i) \quad (2)$$

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城市所能提供的福利有两个基本的来源:第一是城市通过自我融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第二是作为传统的城市偏向政策的遗产,城市还有可能获得各种形式的补贴,或以汲取农村剩余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资源。这可以表达为:

$$m_i = m_i(f_i, s_i) \quad (3)$$

假定城市的福利在所有市民之间是平均分配的,那么上述效用函数的约束条件为:

$$s.t. \quad f_i = \frac{1}{P}F(\alpha P, K)$$

$$s_i = \frac{1}{P}S(R) \quad (4)$$

第一个约束条件是由城市的生产函数决定的, 其中  $\alpha$  为城市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P$  为城市总人口,  $K$  为城市的资本存量; 第二个约束条件则反映了城市获取再分配资源的能力,  $R$  为城市的级别。城市的级别越高, 调动资源和获取再分配利益的能力也就越强, 所以  $\partial S/\partial R > 0$ 。如果城市人口的增长可以增加市民的福利, 在转轨时期政府在乎市民利益的情况下<sup>①</sup>, 一般而言城市会扩张。以下的分析会发现, 人口变动对市民福利变动的的影响, 不仅与生产函数的性质有关, 也与城市补贴的变化形式有关。

### 1. 齐次生产函数的情形

我们先假定城市生产函数是齐次的, 也就是说(4)式中的生产函数等价于:

$$f_i = F(\alpha, k) \quad (5)$$

其中  $k$  为人均拥有资本存量。因此, 城市规模变化对市民人均福利的影响可以表达为下式:

$$\frac{dm_i}{dP} = \frac{\partial m_i}{\partial F} \cdot \frac{\partial F}{\partial P} +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cdot \frac{\partial s_i}{\partial P} \quad (6)$$

我们知道, 只要  $dm_i/dP > 0$ , 城市就倾向于扩张。因为, 该式所表达的涵义是: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 市民的人均福利水平也会提高。所以我们可以讨论  $dm_i/dP$  的符号变化来确定导致城市扩张的因素。

由于有齐次生产函数的假定, 也就是说, 城市人口增长也带来了产出的同比增长, 因此人均福利中来自于自我融资的部分没有变化, 所以(5)式与人口变动无关, 也即(6)式右边的第一项  $\frac{\partial m_i}{\partial F} \cdot \frac{\partial F}{\partial P} = 0$ 。因此(6)式右边的符号取决于第二项的大小。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cdot \frac{\partial s_i}{\partial P} = \left[ \frac{1}{P} \cdot \frac{\partial S}{\partial P} - \frac{1}{P^2}S \right] \cdot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quad (7)$$

$$(7) \text{ 式可以改写为: }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cdot \frac{\partial s_i}{\partial P} = \frac{S}{P^2} \left[ \frac{\partial S/S}{\partial P/P} - 1 \right] \cdot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quad (8)$$

我们将补贴相对于人口的弹性定义为  $\delta = \frac{\partial S/S}{\partial P/P}$ , 那么(8)式实际上变为: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cdot \frac{\partial s_i}{\partial P} = \frac{S}{P^2} (\delta - 1) \cdot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quad (9)$$

由于补贴越高, 市民的福利也越大, 所以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 0$ , 只要  $\delta > 1$ , (9)式将大于0。

### 2. 非齐次生产函数的情形

如果生产函数是非齐次的, 意味着城市的规模变动对城市的生产率会有影响。那么情况将比上述情形复杂。(6)式变为:

$$\frac{dm_i}{dP} = \frac{\partial m_i}{\partial f_i} \cdot \frac{\partial f_i}{\partial P} +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cdot \frac{\partial s_i}{\partial P} \quad (10)$$

$$\text{所以有: } \frac{dm_i}{dP} = \frac{F}{P^2} (\phi - 1) \cdot \frac{\partial m_i}{\partial f_i} + \frac{S}{P^2} (\delta - 1) \cdot \frac{\partial m_i}{\partial s_i} \quad (11)$$

其中  $\phi = \frac{\partial F/F}{\partial P/P}$  为产出相对于人口的弹性。如果定义市民的福利相对于城市产出的弹性为  $\gamma_f =$

<sup>①</sup> 这是一个真实的假设(参见 Yang et al. 2000)。

$\frac{\partial m_i / m_i}{\partial f_i / f_i}$ ; 福利相对于补贴的弹性为  $\gamma_f = \frac{\partial m_i / m_i}{\partial s_i / s_i}$ , 则 (11) 可以写为

$$\frac{dm_i}{dP} = \frac{m_i}{P} [(\phi - 1) \cdot \gamma_f + (\delta - 1) \gamma_s] = \frac{m_i}{P} [(\phi \gamma_f + \delta \gamma_s) - (\gamma_f + \gamma_s)] \quad (12)$$

假定城市福利来源只包括补贴和城市的自我融资, 则  $\gamma_f + \gamma_s = 1$ , 此时城市扩张的条件为:

$$\phi \gamma_f + \delta \gamma_s > 1 \quad (13)$$

### 三、什么因素推动中国城市增长: 计量经济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描述我们知道, 通过城市经济发展增强城市自我融资能力以及通过行政手段获取再分配资源, 是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力。这种双轨式的城市发展模式既有别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发展模式, 即通过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来发展城市并实现工业化, 也区别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通过劳动力与资本的自由流动, 实现生产要素积聚的城市发展模式。从经验上观察, 这种转型特点表现为两种动力都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且, 由于整个经济体制逐渐由过去的行政命令型转向更分权化的经济, 不同地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日趋明显。表现在城市发展的模式方面, 则体现为城市分化为不同类型, 而且所依赖的发展动力也有所不同。下面, 我们将使用中国城市的加总数据, 对转轨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进行计量分析。

#### 1. 估计方程

为了验证我们关于中国转型时期城市发展特点的假说, 我们构造下面一个简单的经验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GPOP_{i,t} = \alpha_0 + \beta_1 PGDP_{i,t-1} + \beta_2 HIER_{i,t-1} + T + \varepsilon_{i,t} \quad (14)$$

其中,  $GPOP_{i,t}$  为当期的人口增长率。虽然城市的发展可以从多个维度来反映, 但城市人口的增长无疑是城市扩张的最主要指标  $PGDP_{i,t-1}$ 。为上期的人均  $GDP$ 。我们假定上期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会对以后的城市人口增长产生影响。  $HIER_{i,t-1}$  为城市支持系数, 是我们构造的反映城市级别影响的系数, 用城市的行政区划人口除以城区非农人口而得。通过前面的描述我们知道,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级层是按照当时的城乡关系确定的, 即为了最大限度地汲取农业剩余而形成的城市发展模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看, 城乡资源配置似乎是分割的, 形成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但从计划目标来看, 实际上城乡的资源配置是一体的, 即城市的发展仰仗其触角所及而获得的农业剩余。城市的级别越高, 其所覆盖的行政范围也就越大, 调动资源的范围也就随之扩大。  $T$  为时间趋势变量,  $\varepsilon_{i,t}$  为残差项。

#### 2.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 1990-2001 各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该《年鉴》公布了历年分级别的城市人口数, 包括城区人口、行政区人口、城区非农人口等。关于每一个城市, 我们既知道其城区非农人口的数量, 也知道其行政区划内总人口的数量, 由此可以计算出本文最重要的解释变量——支持系数, 即城市的发展获得其行政区域内支持的可能性。此外, 我们的数据还包括社会发展状况, 城市行政级别等内容。本文使用的  $GDP$  数均按 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 根据《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分省  $GDP$  数值对各城市的现价  $GDP$  进行平减。

#### 3. 可能出现的计量问题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分城市的时间序列数据, 所以, 在对上述经验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分析时, 一些与混合数据模型有关的计量经济问题值得重视。首先,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 城市之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在我们的经验模型中无法包含所有解释城市扩张决定因子的变量。因而这些遗失变量 (*left out variables*) 将会被包含在扰动项中。如果选择的解释变量与这些不可观测的城市特征变量

相关,则会导致我们的估计式有偏。由于固定效果模型并不假设解释变量与残差项不相关,采用这种模型形式可以消除遗失变量造成的有偏估计问题。其次,由于我们使用的1990—2002年年度数据中,当年的残差项会对下一年度产生影响,因此,序列相关问题可能会影响估计结果。根据 *Islam* (1995) 的建议,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使用5年间隔的数据点有助于消除序列相关问题。此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会导致估计有偏,因此,这一问题也值得考虑。传统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工具变量来消除内生性的影响。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为了减弱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将解释变量滞后1期,以期得到较为合理的估计结果。

#### 4. 估计结果

表1列出了对方程(14)进行的估计结果。表中第一列显示的是最基本的 *OLS* 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R^2$  的值为0.21,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三变量模型解释了城市人口变化的21%。趋势变量旨在体现一些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但可能不随地区变化或地区间差异很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如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等。在第一列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自我融资效果和行政级别都对城市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二者的弹性分别为0.21和0.11。但是,如前所述,由于一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可能没有被包括在估计方程中,从而导致设定式错误(*mis-specification*),并产生有偏的估计式。为了消除各城市不可观测的特征对估计式的影响,一个传统的方法就是使用固定效果模型。第二列给出的就是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计值。我们可以看到,估计系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我融资水平的弹性由0.21上升到0.62;而行政级别的影响由0.11上升至0.19。*Hausman* 检验的统计值也表明,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计要优于随机效果模型。因此,在进行分地区估计的时候,固定效果模型成为本文的基本估计式。

表1 城市发展与级别:全国与分地区的估计

	(1)	(2)	(3)	(4)	(5)
变量及参数	全国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5年前的人均 $GDP^2$	.209(11.02)	.620(13.30)	.706(12.31)	.567(6.56)	.557(2.91)
5年前的支持系数 <sup>2</sup>	.108(6.56)	.194(6.35)	.047(.080)	.208(5.22)	.241(2.76)
年度虚拟变量	-.114(3.53)	-.362(8.24)	-.355(5.94)	-.388(5.77)	-.286(1.91)
常数项	-.025(.64)	.064(.98)	.080(.67)	.198(1.89)	.104(.56)
城市固定效果	无	有	有	有	有
$R^2$ ( <i>Adj-R</i> <sup>2</sup> )	.208(.205)	.203	.351	.223	.100
<i>F</i>	78.22	109.90	134.14	28.07	6.63
<i>Prob &gt; F</i>	0	0	0	0	0
<i>Hausman</i> 检验	—	227.94	—	—	—
观察值数	897	897	371	362	164

注:1. 括号中的数字为 *t* 值。

2. 为对数形式。

3. 被解释变量为近5年来人口变化的对数。三类地区的划分为:东部地区,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其余为西部地区。

4. 由于考虑到特大城市实际上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享受资源的再分配,所以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未包含在估计方程内。

通过以前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显著变化体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其一,自我融资能力也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不再如计划经济时代仅仅依靠城市偏向战略再分配

资源;其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虽然第一和第二列的估计表明,自我融资能力和城市的行政级别对城市发展都有影响,但它们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之间是否有差异呢?第三至第五列的回归结果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第三列给出的是对东部地区城市的估计,我们可以发现融资能力的作用更为明显,弹性值上升至0.71;而行政级别的影响不仅弹性值下降(仅为0.05),且统计上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东部地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发展已经大致过渡到以城市自我融资为主的发展模式,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于东部地区城市发展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第四列和第五列分别给出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市的估计结果。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基本相似,转型经济的特点仍然明显。也就是说,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依靠再分配手段获取经济资源仍然是维持城市发展的主要手段,支持系数的弹性值大致为0.21至0.24,而融资能力的弹性值为0.56左右。

这一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在城市发展模式上非常相似,且显著区别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转型特点已不是很明显,城市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特点业已基本形成;而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浓厚的转型特征,行政分配资源仍然对城市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

#### 四、总结与政策含义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既区别于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市场经济力量(如城市的自我融资能力)和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行政级别的影响)这两种形式都对城市的发展起作用。正是由于转型时期城市发展的动力不再是单一的、纯粹化的,所以城市发展的类型更容易分化,每一个城市都会依赖自身的资源和比较优势来发展。然而,由于依靠再分配发展城市的模式,阻碍人口的自由迁移,可能导致国家城市化整体格局的扭曲。从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作为市场化结果的变化,因此,进一步推进城市社会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进程,可以为城市发展从再分配模式向自我融资模式转化,从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机制。

#### 参考文献

- 蔡、郁阳、王美艳,2001:《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保护》,《经济研究》第12期。
- Black, D. and Henderson, V., 1999,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7, No. 2, 252—284
- Cai, Fang and Deven Wang. 1999,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Labour Contribution in China", in *Journal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10.
- Henderson, J. (1974) "The Size and Types of C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 640—656.
- Henderson, V. and Becker, 1998, "Political Economy of City Sizes and Formation", Working Paper at Brown University.
- Islam, N., 1995, "Growth Empirics: A panel data approa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 1127—1170.
- Krugman, P. R., 1993, "On the Number and Location of Cities." *European Econ. Rev.* 37: 293—298
- Lin, J. Yifu, Fang Cai, and Zhou Li, 1996,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Marshall, A.,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 Mills, E., 1967,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an Are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197—210
- Yang, Dennis and Cai Fang,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ural-Urban Divide",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 Working Paper No. 62*, 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 A Research on the Equity of the Reform of Chinese Health Insurance

Wu Chengpi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equity of a general mode of the reform of Chinese health insurance-Weihai mode. Firstly it discusses the total inequality of access to the health system and the finance system of health insurance by calculating the Gini index, Atkinson index and Hloss which is proposed by the author. Then it studi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equality by multi-factor regression. The effecton of the finance system on the redistribution is also discussed.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Weihai mode improved the equity influenced by income, but the effecton of other factors is different with each other. The equ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improved after the reform, however the financial system enlarged the equality of income, and the change of the effecton relied on the extent of risk aversion.

**Key Words:** health insurance; reform; equity; inequality

**JEL Classification:** I180, G220, D630

# Urban Expans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Hierarchy of City, Financing Capacity and Migration Policy

Cai Fang & Du Ya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ity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hinese transition economy distinguishes both from that in market economy and from that in traditional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Both the market forces (such as the ability of self-financing) and gaining resources by redistribution (impacts of hierarchy) work. From our econometric analysis it can be seen that, with marketization, the eastern region has transferred to self-financing dominated pattern of city development, whil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still rely heavily on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Cities relying on redistribution are more possible to block up migration, which distort the structure of urbanization at national level. Thus marketizing the social service and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will speed up the changes from pattern of redistribution to self-financing pattern so as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in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city; urban hierarchy; self-financ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JEL Classification:** R0, P2, R23

# The Rise and Fall of Tax Farm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Contractual Choices in tax Collection

Ma J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Before the 19<sup>th</sup> and even early 20<sup>th</sup> centuries, tax farming was the dominant mechanism the state employed to collect taxes.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in depth research on it. Currently, modified system of tax farming appeared in USA, Britain,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Therefore, a historical study of tax farming in history is very useful. Drawing from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why tax farming rose and fell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It first compares tax farming systems in this period, and identifies five patterns of tax farming. Next, it reviews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about tax farming. Upon this, this paper approaches tax far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ual choice, and develops a transaction cost model to examine the state's contractual choices in tax collection.

**Key Words:** Tax Farming; Transaction Cost; Contractual Choices

**JEL Classification:** N400, D230